

京都寺院园林与江南文化

王 铁 军

一、日本佛教流派与中国

目前，日本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时期有两个说法。其一就是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述，认为佛教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公元552年，即日本飞鸟时代的钦明天皇13年。根据该书的记述，552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圣明王将释迦佛的金铜像和有关佛教的经书献给了钦明天皇。另外一种说法为公元538年，比前者在时间上提前了14年。这种说法主要源于《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中“志癸島天皇御世 戊午年十月十二日”以及《元兴寺伽蓝缘起》中“天國案春岐廣庭天皇七年歲戊午十二月”的有关记述。上述两种说法中，后者为许多学者所公认，并被列入了历史教科书中，公元538年作为日本“佛教公传”的时期的说法已成定论。

佛教传入日本之初，虽然受到物部氏一族等神道人士的排斥，但同时也得到了苏我氏以及皇族的支持。这使得佛教在日本开始根植于日本文化中。经历了奈良、平安、镰仓、南北朝、战国、安土桃山以及江户幕府时代后，得到很大发展，从信仰的佛像到传教的方式以及寺院的建筑上形成了日本独有的佛教系统，即日本佛教。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虽然受到明治政府的尊崇神教、“废佛毁寺”政策的影响，但由于日本佛教历经1千余年，其影响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中，故此其破坏程度仅仅限于寺院以及佛像的供奉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从而使得日本佛教到了近现代后，逐渐形成了固有宗派和流派。

通常我们将日本现在的佛教流派归纳为十三宗五十六派。按照正式的说法，现在日本佛教有律宗、净土真宗、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真言宗、华严宗、法相宗、日莲宗、天台宗、黄檗宗、时宗、融通念仏宗等十三宗。进而在十三宗中，又形成了56个流派。这56个流派中，天台宗中有天台宗、天台寺门宗和天台真盛宗；真言宗中有真言宗高野派、真言宗大觉寺派、真言宗御室派（上述流派属于古义真言宗）、东寺真言宗、真言宗善通寺派、真言宗山阶派、真言宗泉涌寺派、真言宗智山派、真言律宗；净土宗中有净土宗、净土宗西山光明寺派（即西山净土宗）、净土宗西山深草派、净土宗西山禅林寺派；临济宗中有临济宗建仁寺派、临济宗东福寺派、临济宗建长寺派、临济宗円觉寺派、临济宗南禅寺派等14派；净土真宗中有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高田派、真宗佛光寺派、真宗木边派等10派；日莲宗中有日莲宗、显本法华宗、本隆寺派、日莲正宗、本门宗等9派等。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日本的历史途径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最初的佛教是经由朝鲜半岛，二是中国直接传入，三是印度传入。其中，由于当时中国的隋唐以及宋明时期，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比较频繁，故此，中国成为了佛教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中国成为了日本佛教的主要信息地，中国佛教不仅促使了日本佛教的形成，而且也使得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形成的佛教思想直接影响了日本佛教。换言之，日本佛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能够从日本佛教的寺院建筑、佛经以及仪式中找到中国佛教

的影子。

二、日本佛教圣地之一：京都

虽然日本佛教在汲取了中国佛教后形成了日本独有的佛教体系，但是在其发展和传布过程中同样也离不开为政者的支持和庇护。有关这点，日本佛教同中国宗教一样都有着相同的传布和发展的模式。即宗教需要得到为政者的支持和庇护，作为回报，宗教需要为统治者提供精神和思想上的统治依据。正是由于日本佛教同当时为政者形成了“连体婴儿”般的不可分离的关系，使得日本的佛教寺院大多比较集中在当时统治者的权力中心地如奈良、镰仓、京都等政治权力中心，以及“藩主”所在地金泽、名古屋、弘前、大阪、岗山等“城下町”附近。其中，在以奈良为政治中心的奈良时期，奈良附近就形成了以法相宗、俱舍宗、三论宗、成实宗以及华严宗和律宗的南都六宗。而在平安和镰仓时代，由于镰仓成为了当时武士阶层的权力中心，便形成了以镰仓地区为中心的净土宗、净土真宗以及临济宗、曹洞宗等佛教宗派的兴盛。加贺藩“城下町”的金泽位于加贺藩的权力中心，佛教得到了历代加贺藩主在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以及庇护，金泽地区形成了佛教寺院的集中地。京都的佛教发展也再类同上述情况下而发展的。

起初，由于日本为政者将政治中心从长岗京迁移到了京都，一些神社和佛教寺院也迁移到了京都。其后，很长年代里，京都天皇皇宫所在地，日本政治权力中心，京都地区内又陆续兴建了不少佛教寺院，形成了日本佛教诸教派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其中，净土真宗中的真宗大谷派、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总本山”的东本愿寺和西本愿寺；净土宗中的净土宗本派、西山净土宗派、净土宗西山深草派的“总本山”知恩院、光明寺、誓愿寺；临济宗中的东福寺派、天龙寺派、建仁寺派等的“总本山”东福寺、天龙寺、建仁寺；属于真言宗中的东寺派、醍醐派、御室派、山阶派、丰山派以及智山派的“总本山”或“大本山”的东寺、醍醐寺、仁和寺、劝修寺、长谷寺和智积院等都建在了京都。京都成为日本各个佛教教宗共存、教派共荣的佛教圣地之一。

三、京都佛教建筑与江南文化

自平安时代以来，在京都各地建立的佛教寺院，包容了各个教宗和教派，形成了京都佛教独有的风格。概言之，有以下几个不同与日本其他地区佛教寺院的特征。第一，平安时代以来，伴随京都佛教兴盛而修建的寺院建筑，无论是其宗派教祖，还是其寺院建筑，都同中国佛教和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这点，京都虽然与奈良和镰仓相似，但却不同与和歌山熊野山和京都北部的比叡山佛教寺院。京都寺院中不仅有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南禅寺等临济宗派因研究和著述汉文学而得名的五山文学，而且其教宗的“教祖”大多留学中国，直接拜师于中国的名师高僧。其中，如真言宗开祖弘法大师空海就是入唐求法，拜师于惠果大师后在京都建立了教王护国寺（东寺）。日本曹洞宗开祖道元也是在中国禅僧如净的门下，参禅修道4年后回国，在京城建仁寺修道后，开创了曹洞宗教宗体系。日本临济宗开祖荣西大师则是两次渡海到宋，在中国天台山参禅悟道后回国。被日本黄檗宗视为开祖的隐元则是中国明朝禅师，其在北京南部修建的万福寺则完全按照中国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西北的黄檗山万福寺。位于京都市内的天龙寺则因向中国派遣天龙寺船进行贸易的

关系，其寺内的字画屏风无不与中国有关。

第二，因为京都寺院与中国有此渊源联系，京都寺院中的屏风画或壁画也大多受到中国画风的影响，或是其素材源于中国。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天龙寺、建仁寺的云龙图和大龙双图。天龙寺的云龙图为日本著名画家加山又造于1997年应约而作；建仁寺的大龙双图为日本画家小泉淳作之作，完成于2002年4月。两者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大胆地将龙的四爪画为五爪，突破了关于龙爪本身的政治图腾和禁忌外，其素材都源于中国关于云龙的传说。当然，这些现代作品本身不能说明古代中国和京都的关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天龙寺，还



京都建仁寺法堂内双龙图双龙图局部 2011年4月17日拍摄



京都天龙寺法堂内云龙图云龙图局部
平田精耕等《天龙寺》（淡交社，2007年）2010年11月4日拍摄



天龙寺内曹源池局部 2010年11月4日拍摄

是建仁寺关于请求现代画家画云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古代中国和京都间本身关联的延续。此外，我们从天龙寺和建仁寺所收藏的屏风、书画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关联。

第三，京都佛教寺院一般均建有寺院园林。有关这一点似乎有别于日本其它地区的佛教寺院。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园林文化比较研究中，把欧洲的喷泉为主的园林景观归纳为欧洲式人工园林，而将尽力保持自然状态，鲜以人工的日本、中国、朝鲜半岛的园林归纳为亚洲式的自然园林景观。这一点说明，就其园林建筑理念而言，中日之间的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在同属于亚洲园林景观中，中国、日本以及朝鲜的园林也各有其独自的特点。

就日本园林而言，大体上分为枯山水式、池泉式、筑山式以及茶庭式和回游式等；而中国庭园则有回游式、筑山式等。中日间的园林区别主要体现在中日间的园林师对于园林中的山、水、花草在排列上所赋予的意义不同。日本的枯山水式园林中，园林师将每一块石头按照石头的大小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而在以太湖石为代表的江南园林中，园林师们在千姿百态的石头中追求的“神似”和意境。在池泉式和筑山式园林中，日本同中国江南的园林间，除去江南园林中的月亮门和太湖石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上述要素考虑，京都寺院中的园林同江南园林在造园理念和山水排列、布局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其间，京都寺院园林样式受中国江南文化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其推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第一，如前所述，京都佛教教宗的开祖或名僧几乎都有留学中国的经历。他们渡海求法到达中国，大多为经由舟山群岛到达明州（现浙江省宁波）。通过明州后再辗转西安、开封、五台山等佛教圣地寻师求法。留学僧返回日本的乘船地也大多选在明州。受当时海上交通条件的限制，留学僧们还需在明州周边都邑停留数日乃至数月，以等待海上顺风季节的来临。在等待之际，应有足够时间去领略江南文化风光或江南园林景观。这些留学僧人可能不是造园师，但返回日本佛寺后，可能会按照中国江南园林景观的理念来要求日本的造园师进行自己寺院的园林规划，或要求园林师在寺院内进行造园。

第二，在我们考察了天龙寺、建仁寺、南禅寺、东福寺以及万福寺等京都寺院的园林后，发现这些寺院园林大多属于日本池泉式或筑山庭式园林。一方面，京都寺院的池泉式或筑山庭式园林与日本其它地方的园林有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如石川县的兼六园和岗山的后乐园以及京都御所等地的园林大多依托原来的自然的地形地势造园，并栽植花草，引水为湖，并没有太多人工的对石材的排列和摆布。相比较而言，京都寺院中的园林同中国江南园林一样，

大多借景以背后的丘陵远山，掘土为池，施石为基，并以花草树木和石桥为衬，春吟梅花夏观荷，秋赏枫红冬悟雪，借花草树木以反映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同时，京都这些寺院园林同中国江南园林一样，更多利用对石头的堆砌来体现对自然美的追求。单就这一点，京都佛寺的园林景观与江南园林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如天龙寺的曹源池就是在借助日本自然造园的理念基础上，更多地依托石头的堆砌和营造石桥来表现了造园师的自然理念。

第三，京都寺院的园林同中国江南园林一样，大多利用低矮错落有致的灌木和花草来体现自然四季的变化之美，而没有栽植高树木来进行造园，当然也没有过度地对树木进行人工修剪。有关这一点，我们试图通过京都寺院园林、江南园林同日本其它园林进行了比较发现。日本的其它园林，无论是个人家居内的小园林，还是像京都地区的円山公园、神泉苑、金阁寺等名园林，大多栽植高大树木，并施以人工修剪成形，这在京都寺院中的园林则非常少见。

当然，上述京都寺院园林与中国江南文化的影响，更多属于个人直观推测和感觉，而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上的证据和佐证。其实，真正营造京都寺院园林的是日本的造园师，而不是留学僧。无论留学或游学中国的日本名僧有多大程度地对江南园林和文化的领悟，其最大的可能性是要求日本的造园师在寺院内营造园林，而其寺院内的园林是否能够按照江南园林的样式造园或是否借鉴中国江南文化园林还取决于造园师。因而，我们还需要对营造这些京都寺院园林的造园师及其系列作品进行比对和考证，显然这已经超越本文的研究范围及能力所限，使得本文对京都寺院园林和江南文化的纽带联系的佐证明显不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京都寺院园林在同其他日本园林的比较中，有着特有的造园思想和艺术风格。概而言之，在有限的空间内，试图通过园内的自然的树木、花草、湖水和堆砌的石材来表现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非人工的修剪素材景色变化给人以无限的空间想象。其表现的素材方式和理念即相同于江南园林，又有别于日本其他园林。